

上 篇

方 法

历史的“信号”与“噪音”

厄本：历史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抑或两者都有一点呢？自从笛卡尔和维科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理智上的好奇心促使我们和兰克一起要求“如实直书”而情绪上的激动又导致我们和歌德一起相信“我们从历史中获得的最珍贵的东西是它所激起的热情”。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讨论——即探讨它们是否不同于我们从诗歌或数学中所发现的那种事实——我们也许能够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某个答案。所谓历史学家对其事实的选择是主观武断的这种指责，就如同通常出现的相反的指责一样，即认为历史学家只不过是一个剪剪贴贴的人——他不是历史事实的主人，而是记录事件的编年史家。假如他是一个制模工，那末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资格就成问题了。卡尔·波普尔爵士写道（他在重复 H·A·L·费希尔的话）：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独特的历史过程。……它的说明书……不是一份法令，而仅仅是一份独特的历史陈述”。假如他是一个原色布织工，那末他就会被（如 J·H·普卢姆）指责为“像蚂蚁一样匆匆越过岁月的残骸，而他的眼光却往往还比不上蚂蚁的无数历史学家”中的一个。

那末 历史学家如何驾驭他的‘事实探测器’越过这岁月的残骸呢？弗雷德·霍伊尔爵士在《关于凡人与豪杰》一著中有这样一段话，它要求历史学家牢记用精密科学所逐渐形成的那种方法去寻找他的事实：

“机遇作用发生在科学和人类的一切活动之中。要把机遇作用——物理学家称之为‘噪音’——同有序趋向区分开来 这确实是历史学家不得不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也许就是最重大的问题。我常怀疑，我的一些历史学同行犯了一种错误 即认为必须通晓一切的一切，……而没有认真尝试过把什么是无序的同什么是有序的区分开来。当然，进行这样一种区分显然是有危险的。……但是，同样的问题的确既发生在自然科学之中 也发生在人文科学之中 而科学家已经逐渐形成了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物理学中几乎从未出现过有关信号与噪音的重大争论。……（历史学家 并没有完全确信什么是重要的和什么是轻微的 因此，一切东西都得囊括进去。”

汤因比 我认为 无论在自然科学中还是在人类事务的研究中，测定什么是机遇和什么是规律——即规则性——之间的差别，就是一个人对非人性结构和人性结构所形成的概念。在人性与物质性中，必定有某种共同的规则性的因素。我想 它们之间的差别只是程度上的差别 人性显然要微妙得多，它中间有更多难以捉摸的东西。让我举两个

例子来说明我的意思吧。在人类事务的研究中，选择什么是意义重大的，并选择什么在将来可以被证实是意义重大的，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获悉，伦敦档案局在国内刚成立的时候，里面堆满了大量文件，以致它的负责人说，他们连所有这些文件都无法收藏，更不用说处理这些文件了。他们认为，他们将不得不销毁其中很大一部分，并讨论过究竟应该销毁些什么文件。我得知，他们销毁了有关在英国建造铁路的全部文件——包括公家的和私人的文件——其理由是，这种枯燥单调的主题不可能引起任何人的兴趣。而在今天，经济学家为了得到这些档案，会不惜任何代价的。关键在于，一个人在不到一个世纪以前时无法轻易地预言，究竟什么东西在现时会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奥古斯都时代的。当时，希腊文学研究者断言，5 世纪和 4 世纪的雅典文学是极其标准的，人们必须设法再按这种雅典形式来进行写作。他们抹煞了在原始的、古典的雅典形式与他们自己的、伪装的雅典形式之间所存在的差别。这就是把学究式的、纯文体的标准应用于一个主题的例子。在上述情况下，这样的标准不仅不适当，而且肯定是有害的。今天，为了获得在这两个时期之间失去的文学作品，我们会不惜任何代价的。

这里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死亡问题。在自然科学中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尽管原子在不断死亡，以得到再生——假如我可以这样比喻的话——但它们的这种活动是如此频繁，以致于个别原子的分解和重组就显得没有多大意义。

① 原文如此。实际应是公元前 5 世纪和前 4 世纪。——译者注

了。然而，在人类事务中，个别人物的生存期限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假如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菲利普没有被刺，而是尽其天年，那末亚历山大就不会有他的那一番事业了。假如亚历山大在 33 岁时没有病逝，而是活到他手下那些将军的平均年龄——他们都相当长寿——即活到 70 岁或 80 岁，那末历史就完全不同了。

客观上人的死亡事故和主观上人的预测困难——即任何人都难以从长远观点预见到什么东西看来将是意义重大的——，致使历史学家要把信号与噪音区分开来是极端困难的。霍伊尔说得完全正确，而我还未看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文明都可以说是同时代的。再就价值尺度而言，与原始社会的状况相比，各个文明形态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巨大非凡的，而与人类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文明的价值都可以说是相等的，谁也没有资格瞧不起谁。

由此，汤因比得出结论：一切文明形态都是可比的——历史学家不仅应当将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与现代西方的历史进行纵向比较，而且还应当把一切文明的全部历史进行横向比较，这样才能从整体上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

三、每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四个阶段。

在汤因比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把生物学的规律运用到文明研究之中，提出了文明兴衰的四阶段论，认为文明形态就像一个有机体，每一个文明都要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这样四个阶段，并以此作为他描绘整个人类历史的模式。

汤因比曾把文明形态的这一周期性发展比作织布机梭子或车轮，它每往来穿梭或转动一次，并不是回到原地，而是织出了新图案或向前进了一步；也就是说，每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这样四个阶段，后一代文明就比前一代文明有所进步。人类历史正是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向前发展的。

四、文明兴衰的动因是“挑战——应战”机制。

汤因比认为，历史发展的全部过程表现为摆在某个文明面前的一系列重大任务，以及人类对这些任务的一系列解决方式。他把摆在当前的重大任务称为“挑战”，把解决

历史——胜利者的宣传

厄本：上述问题的答案没有找到，而历史学家工作的不可靠性却使那些浅薄的涉猎者和别有用心的人轻而易举地把他的资料冒充为真正的论文。尽管如此，历史学家还是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衡量标准的：他们谈及在学术上真诚可靠的著作，谈及在研究上和技巧上成功的著作，还谈及可以接受的历史和不可接受的历史。当历史学家作出这些区分的时候，他们所采用的是哪种标准呢？当我们说艾尔弗雷德·罗森堡的著作或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由于缺乏学术上的真诚而不可接受的时候，我们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

汤因比：让我们先谈谈偏见很深的历史吧。尽管罗森堡是一个合适的例子，但是历史学家的偏见往往被更巧妙地伪装起来。有许多史学讨论会——它们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会，而是背后藏有政治意图的讨论会——的争论都被伪装成学术上的争论。例如，斯堪的那维亚人对早期俄国历史究竟作出过——假如作出过的话——什么贡献呢？斯拉夫人在公元6世纪和7世纪究竟把希腊人赶出多远——今天的希腊人究竟主要是这些斯拉夫人的后裔还是实际上

纯血统的希腊人呢？罗马尼亚人究竟是在马扎尔人之前来到匈牙利的，还是在马扎尔人已定居于喀尔巴阡盆地之后才来的呢？所有这些问题，都被人们按照政治——民族的方针滔滔不绝地讨论着。没有介入政治的人很快就能察觉到隐藏在争论背后的偏见。然而更为困难的是，有些人却相信他们拥有关于宇宙万物的永恒而可靠的真理。假如你是一个犹太人，并且正在研究基督教对《旧约全书》前五篇的解释，那末你就会对基督教徒所采取的方式——他们粗鲁地歪曲了《旧约全书》显而易见的原意，使之转变成为基督教的预言——感到惊讶和厌恶。但是，假如你再查阅一下《旧约全书》的前五篇，那末你将看到，正是犹太人自己——如圣经考证学所表明的那样——歪曲了历史，使之适应犹太教关于历史的一神论学说，即所谓唯一的天神耶和華的天意形成了人类事务的历史。现在这种特殊的关于往事如何形成的说法与一种更高层次的宗教哲学相吻合，它比罗森堡更受到尊重，因而也就更令人生畏得多。——

厄本：——历史是胜利者的宣传，——

汤因比：——的确如此，而你却不可能探明这些歪曲了的真相。考古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根据腓尼基人和腓力斯人的观点已经开始改写圣经故事。虽然腓尼基人和腓力斯人所写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但我们正在从庙宇、偶像等遗迹中得到其物质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证据。例如在叙利亚北部的萨姆拉赫角，我们已经挖掘出一些公元前 14 世纪的石碑，上面刻有许多腓尼基人的神话。虽然才这么一部分石碑，但仅仅从这么一部分石碑上，考古学家就能够发现腓尼基人和腓力斯人所陈述的情况。他们所能够办到的就是表

明圣经只得被人们有保留地接受，而我们必须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犹太人一边讲故事，一边溜走了。关于犹太人及其邻人关系的生动描述，被基督教徒按照犹太人的观点完全继承下来。即使是那些一直敌视犹太人的基督教徒，也不可能摆脱犹太人对历史的这种描述。因此，胜利者确实具有一种巨大的优越性；而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

厄本：你似乎非常相信，有必要假设在你个人生活中也有受害者。菲利普·汤因比告诉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你如何让他到土耳其和德国去作一次可以说有意义的旅游，因为你感到，战争宣传已经歪曲了英国人对这些国家的印象，而你并不想要你儿子受到一种如此不可靠的观点的教育。

汤因比：19世纪英国强盛的时候，他们拥有通常被称为“被压迫民族”的外国宠儿。1848—1849年以后，马扎尔人一度是英国自由党人的宠儿。后来，像西顿沃森那样的人看到，斯洛伐克人和匈牙利境内的罗马尼亚人不能从马扎尔人那里得到公平的待遇，于是他们变成了英国人的宠儿以反对马扎尔人，这使马扎尔人感到极其愕然因此，这大概是喜欢做被压迫民族庇护者的贵族们的英国人所遗留下来的一种影响。A·J·P·泰勒最近（在他所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之中）所作的关于希特勒的生动描述，就是这种态度的一个新近的、偏激的例子——这是一个间接的证明——：当希特勒受辱时，一个英国人便站起来保护他。假如希特勒胜利了，建立了他的千年帝国，那末泰勒就会感到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了。

现在 与圣经故事——它有那种采纳胜利者单方面命名原则的危险——相似的一个例子是古希腊史，它几乎全部是按照雅典人的观点撰写的。在记述所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每一个近代历史学家都用雅典人的观点进行观察，即认为敌人是伯罗奔尼撒人。我们不提雅典——伯罗奔尼撒战争。然而，假如是斯巴达人和比奥提亚人描写这个故事 并且这个故事流传下来的话 那末我们就会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了。我一直非常相信，有必要削弱胜利者所作的宣传的重要性。我曾写过一部篇幅较大的著作来论述一小段罗马的历史，书名叫《汉尼拔的遗产》。这是因为我充分意识到，罗马人不仅按照自己的观点撰写有关他们与其他人交往的历史 而且还把这种观点强加于近代世界 我们谈论布匿战争 而不提罗马——布匿战争 装出一副我们是面对迦太基人的真罗马人的样子。然而，假如我们有一份迦太基历史学家撰写的关于这些战争的报道，那末我们大概会发现 罗马的布匿战争被称为‘迦太基的‘罗马战争’。’一场战争的双重名称是充分中立的唯一方式。我们有证据表明，曾出现过同情迦太基而不同情罗马的希腊历史学家所撰写的关于罗马与迦太基的战争及和解的历史，它们有时还被波利比阿引用过。但是，这些著作都没有保存下来，而同情罗马的波利比阿的著作却流传至今，这并不是偶然的事。《旧约全书·列王纪》的故事中关于腓力斯人或腓尼基人的描述没有流传下来 这也并非偶然的事。不过 除了考古学以外 我们还是具有一些观点‘不确定’的证据 因为犹太人和雅典人两者都有一个反对派。预言家可以说是犹太人历史的内部批评者，而像柏拉图和修昔底德那样的

则瞥见雅典人自己对雅典民主政体所提出的一些内部的非难甚至谴责。因此，幸亏在得胜派内部有一个反对派，胜利者所叙述的故事——尽管他们垄断了陈述故事的权力——才不致于是一种完全自相一致的描写，即没有把雅典人和犹太人说成一直是善良的，而把他们的敌人说成一直是邪恶的。这里面就存在着一些反证。

历史学家的选择与偏见

汤因比：我们正在尽力寻找客观性的标准。历史学家在没有偏见的好奇心所指引的范围内，大概是处于安全地位的。然而，好奇心本身却是主观的，因为我们并不对一切事物都普遍感到好奇。对人类事务的任何研究都必然带有选择性。假设某人掌握着单独一天之内在全世界出版的所有报纸，并假设他得到保证说所报道的每一个字都是像福音一样的真理，那末他拿着这些报纸能干什么呢？他又如何组织它们呢？再进一步假设他认为所有的事实都是同样重要的——可他就是无法写成一部掺合所有这些事实的单独一天的历史。他不得不进行选择，而且，即使他把所有事实都转载出来，他也只能突出一些事实，并贬低另外一些事实。而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开始变得主观了。我意识到偏爱和成见在起作用，但是对于作家本人来说，要看到它们是非常困难的。

历史事实的确不是什么可以被你拣起来抚弄的具体的东西，如一块砖头或一块石头那样。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事实是人为的——它是人们从原始材料中选择出来的结果。即使是一块砖头，也是人们从这个世界的泥土中选择出来

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困难。我认为，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有许多东西要向自然科学家学习，因为自然科学家对真理极其忠实。如果有个别证据使他们的假说站不住脚，他们就准备无情地勾销其最珍贵的假说。这正是科学家的荣誉所在。自不必说 历史学家现在也应该具有这种荣誉感 如果进一步的研究要求进行变更——这不仅是由于发现或产生了新的事实，而且也由于进一步反思了现存的所谓事实的缘故——那末我们总该准备重新思考 抛弃那些最珍贵的体系 或抛弃那些所选择的事实 或抛弃那些对所谓事实的看法。

这是非常必要的。

厄本：你的意思是说，历史是历史学家所撰写的，而不是实际上所发生的，因为只有通过历史学家的认识过程，我们才能对另外一堆乱七八糟的事实作出某种意义的解释。然而，我至少可以想起一种值得尊重的观点，它认为，历史学家的真理比科学家的真理更真实，因为它独立于科学实验的人为性之外。R·G·埃尔顿在《历史的实践》一书中令人信服地提出了这一观点。他举例说，为了研究生物化学而处理细胞 甚或从比萨斜塔上扔下一块石头 都是人为的。他说道：“如果没有一种代表实验者愿望的故意的行动 这些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虽然所研究的事物有可能来源于自然界 但在被研究之前 它已经为达到研究目的而被改变了。”历史则不是这样的。埃尔顿争辩道 尽管历史学家可以选择自己中意的课题，但他所面临的仍然是真正的事实——一种与研究无关的死的现实。“正因为历史上的事物是从前的 是不可挽回、不可改变和不可重复的 所以它

的客观真实性是有保证的 它不会因任何意图而改变。”

汤因比 历史学家的确是有选择的 他并不是不加区别地从往事中获取资料，而是选择那些在他看来意义重大的少量资料 并抛弃了另一些资料。事实上 这种行动与科学家的人为的实验是非常相似的。这种相似之处与人脑的活动有关，无论智力是用于研究人性的还是研究非人性的东西 对于人脑的一切作用来说 人脑的活动则是共同的。可以说，这是在对现象的感性认识进行加工——科学家的事实和历史学家的事实一样，在它们能够成为我们所称的事实以前，都经过人脑的加工。因此，我不同意埃尔顿的观点。

厄本：我们理想上的目标应该如你所说，为了过去而公正地研究过去。但是，那样做多半是不会成功的。你在一部著作中提出，历史学家应该“把他的牌摊在桌面上”。然而 我们难道准备相信历史学家能够意识到他的偏见并足以谦虚到把这些偏见公诸于世吗？假如那是可能的话，那末他难道不会首先设法撰写在他看来是没有偏见的历史吗？但是 假设历史学家充分进行自我批评和悔悟 以供认他行李中所带的货物 那末 他难道不想免除公正研究的约束 并用阿克顿的话——即历史学家终究是一位面对过去的政治家——为自己辩解吗？我现在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你本人经常被指责为撰写一种预言式的历史；尽管你已经把自己的牌摊在桌面上了，但你仍然有可能被曲解和误传。因此 历史学家的诚实是没有保证的 我们知道将怎样纠正他为我们所描绘的图象——防止误解的说明似乎是这项任务的组成部分。

汤因比 是的 历史学家可能不会意识到他的最根本的偏见。在别人看来 这些偏见也许是显而易见的 但在历史学家本人看来，这些偏见却被如此盲目地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以致他可能难以将它们提到自觉意识的高度 并将它们展示在自己及读者的面前。

总之 我认为 在人类事务的任何研究中 都必定有一种主观性和相对性的因素。“一个人往往缺乏较好的品质。”旁观者也是一个行动者。他被卷入他正在观察和记录的事件之中。无论该事件在时间上、地点上会如何遥远 他还是要被卷进去 因为这些事件是人类的事件 而他自己就是一个人。如果历史学家是诚实的、具有自我批评精神的，并且很擅长反省艺术和心理分析，那末他肯定将尽最大努力去撰写一部没有偏见的历史 但即使如此 我相信 他的成功最多只能是局部的。

